

安徽文史资料第37辑

12

史海拾貝



安徽人民出版社

貝拾海史

出版登记证号:(皖)01号

史 海 拾 贝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省少管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375 字数:180千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03000

ISBN7—212—00680—7/K·186

定价:3.10元

目 录

回忆抗战末期参与受降的一段经历·····	刘一平(1)
回忆我党领导的豫北师管区训练班·····	傅大章(7)
冒险送张治中先生家属去北平的回忆·····	沈世猷(17)
驻岩寺新四军轶闻琐忆·····	鲍弘德(22)
忆皖南事变后突围·····	张有利(28)
忆抗建艺术社·····	刘芳松(32)
李宗仁到立煌“视察”的见闻·····	廖富荪(41)
教育青少年琐记·····	黄锦恩(48)

从爱国主义者到共产主义战士

——刘一平传略·····	凌庄志(58)
房秩五与史恕卿轶事·····	疏 荻(65)
抗日救国的“第八君子”	

——任崇高传略·····	许嘉庆 叶 芳(68)
王传炯事略·····	马俊如 李振忠(81)
许道珍传略·····	许嘉庆 叶 芳(88)
抗日英杰陈文·····	夏家霖(100)
吴组缙的创作道路·····	张民权(111)
苏雪林传略·····	新 雨(125)
我所知道的严凤英·····	洪 非(139)
忠于人民教育事业的杨效椿·····	章觀华(157)

女画家吴淑娟·····	方少求(161)
-------------	----------

人民教育家汪达之..... 黟县政协文史委员会(163)

沧桑回忆录..... 吴东儒(167)

迎客松下录..... 俞乃蕴(217)

订正·勘误..... (232)

补 白

七绝·受证有感..... 陆正伟(57)

七律·参加李光炯先生揭墓仪式有感..... 何 文(124)

回忆抗战末期参与受降的一段经历

刘一平^① 遗稿

日本投降时，傅作义将军在河套的正规部队东进受降。我作为最先头部队，及时占领包头。现将经过情况概述如下：

1945年5月以前，德、意法西斯先后无条件投降，日本法西斯灭亡之命运已是指日可待，伪军、汉奸更加惶恐不安；全国人民无不以喜悦的心情迎接抗战最后胜利的到来。坚守抗日战线阵地的最左翼绥远省（1954年撤销，并入内蒙古自治区）河套之傅作义部队三十五军，正在积极作反攻准备。

我当时是三十五军三十一师九十三团第三营营长，于七月底，奉命接替河套东端退水渠至乌梁素海中部四柜渡口之间约120华里的河防任务。任务是：（1）警戒和阻歼由卧羊台和大余台方向侵犯之敌人，以待援军的到达。防守重点在西山咀（今乌拉特前旗）退水渠处；（2）随时作好对西山咀外表上之敌人的进攻准备。除协助地方部队对防守区内之老牛沙、二小渡口、四柜渡口等处出入之人员进行盘查外，特在退水渠西山咀处秘设一只军用小船专供接送长官部和军、师情报人员出入防地时使用。

有一名叫苏伯庵的人，是留美学生，与傅将军同乡。负责平绥线上包头、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张家口、平、津等地的情报工作，直接与傅将军联系。每次出入河防区时均乘秘设小船，由河防部队长亲自接送，按时到达，分秒不差。在接送中他从不多言，但在8月

^① 本文作者生前为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安徽省民革主任委员。

7日，我送其过退水渠时，他却很关切地对我说：“老弟，胜利即到，我的工作顺手；你们现在应该迅速派人到公庙子伪绥西联军王英司令部担任联络，以便尔后行动。你是在最前线的部队，应该随时准备行动。”我将此话转报给三十一师师长安春山，并建议把分散在各渡口之连队一律集中到西山咀地区。安同意并对我说：“师已派一上尉情报军官××，即到，由你处过河，你可派一人与其同去。”我指定的是九连排长王建（绥干团时期的学生）。

8月8日，我去各渡口检查并令各连队立即搬到西山咀指定的地区准备行动。9日午后4时，我由四柜渡口回到盐海子边的营部，赵贵红副营长说：“鲁英麟（三十五军）军长命我部在西山咀架桥，限明日晚完成任务。没有材料怎么办？就等你快回来解决。”我即打电话向鲁请示，我说：“如果架简单的浮桥通过小部队，我有准备，三小时内即可完成；如果是通过大部队和骑兵、炮兵、汽车的载重桥，一无器材、二无技术和工具，的确困难，实难完成。”鲁说：“就是载重桥！我即令军、师工兵前往，器材由安北县（现在的新安镇）县长陈质文负责送去。陈和工兵到后均归你指挥，明晚必须完成！”

当时，军、师工兵都住在五原，与西山咀相距120华里，安北县送器材到架桥地点也有30多华里。西山咀附近居民稀少，没有村庄，无树木可利用。必须抓紧时间让陈县长先将材料送到，架桥才有把握。随急电陈县长：“限你于10日晨6时将架桥材（木料、铁丝、铁钉等）送到。否则，到时我俩均担不起。”陈表示照办。10日中午，陈送来三大板车木材，并说：“材料仍在继续搜集中。”工兵午后2时方到。

此时卧羊台的伪军已撤退。军部参谋处催得甚急，我将情况报告给鲁。鲁说：“日本已投降了，架桥已宣布由军负责。现在你为军的先遣部队，配电台一部，即可过河占领卧羊台。11日晨7时出发，限13日中午到达包头并占领之。出发后每双数时联系一次。”我问：

“途中如遇到日、伪军阻拦怎么办？”鲁说：“可用种种手段相机处理，但必须按时到达包头并占领之。”我将任务情况转报师长安春山后，即于黄昏时候渡过退水渠，到东岸的卧羊台宿营。

8月11日午后约5时（当时没有手表），到达公庙子附近，途中挨了两阵大雨，全体官兵衣服都湿透了。王建前来迎接说：“伪绥西联军司令王英和参谋长已随同苏伯庵去包头，现由其副官长率领司令部人员摆队相迎，请到公庙子堡内暂歇。”我将部队稍事布置后，天即入暮。此时用电台、电话与军、师联系，均不通。部队正吃饭间，王建和警戒人员报告：“孙兰峰军长乘汽车到达，请你前去见他。”我见到孙后，即将我的任务和与鲁、安联络不上的情况向其报告。孙立即说：“我负责日寇投降接收工作，先接收包头。从现在起，你归我指挥。警戒要布置好，官兵要吃好、睡好。明晨7时，咱们一同出发。”当时在座的接收大员我所认识的仅有陈光斗、李大超、马秉仁和通日语的苑秘书等。

12日晨出发，约12时左右到了赫业湖洞西南角山麓转弯处，看到孙乘的大卡车停在路旁，孙和接收大员正同一个穿日本军装者谈话。我即趋前去见孙，看到与孙和接收大员谈话的是一个日本军曹，谈话由当地的一居民和一位秘书作翻译。孙对我说：“你来的真快，来的正好。我刚和他谈好了，你叫部队停止前进。”说后，仍和该军曹谈话。我转身低声询问陈光斗是怎么回事？陈说：“这个日本军曹叫竹源，带了十八个日本兵和三十多名伪军守着赫业湖洞这个堡子。他说从广播上知道日本已宣布投降，但他还未接到命令，他认为自己仍有守土的责任，不许我们通过。经苑秘书、李大超再三解说，方许通过和在这休息。而且只能在路南，不能过路北。”

正说着，孙指我向日本军曹说：“这是我的部队指挥官，即在此地休息。你的安全由他负责，附近所有的部队均由他指挥，不许向你攻击。你如果有事要向他报告。我给他留下手令，吃完饭后就走。”说后，即由秘书写一手令，孙签字后交给我。手令原文是：“附近所

有军队统归我军先遣部队长刘一平指挥，不许侵犯赫业湖洞之日军。此令。孙兰峰。”日军曹向我敬礼，我注视这个小军曹 30 来岁，腰挂军刀，皮带上系着一枚手榴弹，胸部虽挺的突出，但面部却流汗不止，是为强打精神模样。我对他说：“有什么事可以找我，我就在这里吃饭。”他说：“不要到路北人家去。”我说：“我这么多人马，路南只几户人家，哪能够住，两边都要占。你不放心，可叫你指挥的人不要出来。”他“哈矣”了一声。翻译说：“遵命。”向我敬个礼，带着两个日本兵回堡子去。

午后 4 时，我正集合部队向包头出发，村长带着竹源曹长，后面跟着十几名日本兵来找我，说是要和我一起去包头。这十几名日本兵的装备只有一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每人一支三八式步枪，行李装在两辆大车上。我规定两条由他选：（1）将枪缴给我，同到包头，保证他们的安全；（2）不缴枪就在我部队前面 1000 公尺或在部队后面 3000 公尺跟进。他说：“各走各的。”我说：“我得向上级报告后再说。”他给我敬了个礼，即带兵返回堡子去。

我离堡东行约 20 余华里，天已黑。听到山坡上有犬马叫声，公路侧出现六、七名蒙古队人。哨兵前去询问，答话者自称叫赫游龙，属新反正的西公旗蒙古队，特来欢迎。赫说：“天已太黑，前面近处没有村庄，部队就在这里住一夜。我给你们安排住处，明天早些出发，中午就可到达包头。”我看其意诚恳，随即同意，他还宰羊犒劳官兵，我对他表示感谢。相谈之下知其即为我师九十一团 1943 年在山西时所攻击的东大社的伪军（油葫芦）团长，原为包头中学学生，粗通日语。现已归西公旗女王奇俊峰指挥。今天他本来准备半夜去赫业湖洞缴日本兵的三八大盖枪。他对我说，是因为我的到来才令其改变了计划。

我取出孙的手令给他看了后，说：“不必了，反正小日本得把枪缴给我们。”他说：“服从命令。”又要和我结拜为兄弟。我说：“已是好朋友了，何必再如此，请把包头的情况介绍一下。现在我和孙、

鲁两军长都联系不上。”我将电话线搭在路旁长途线上说：“请用你的关系向包头有关单位打听一下。”包头的接话员都用日语，他用日语询问了两个单位，得知孙已到包头，住在草市路北伪蒙疆保商督办公署。

13日拂晓出发，约12时到达包头西北，距北门约一里许之村庄住下，尔后确定如何占领包头。我派便衣两名，带村民良民证，一为进城侦察，二乃向孙请示。便衣走后，八连连长吉思圣和机枪连一军官出于好奇，未换便衣也跟着进了城。回来报告说：“日军毫无阻拦，就是见不到孙。”于是我决定将部队归赵贵红指挥，作好行动准备，亲自进城见孙。

我带卫士骑着马进城，守城门的日、伪军非但不阻拦，还向我敬礼。但见到孙后，孙却很惊奇的问我：“你怎么来的，部队在什么地方？这里协定部队不许进城。”我说：“部队现在北门外村内。我和你及鲁军长都联系不上，我还未完成占领包头的任务，特来请示如何行动。”孙说：“部队不要进城。为顺利做好受降工作，避免发生意外，我即派人到伪警备司令部去给你开证明，送你出城，快回去归还建制。三十一师先头部队正在向这里急进中。”

我赶到伪警备司令部开证明时，见有数人在座，由其参谋长（此人30来岁年纪，东北口音）亲书，内中还有一伪宪兵少尉。出伪警备司令部后，我有意看看城内的情况，特由南门绕西城墙外返回部队。路上，见南门内有日军军曹坐在亭子里值班，呆若木偶，也未问我。行至城西南角义地小道时，遇到竹源曹长带着17名日兵整队到达，他向我敬礼致意时仍似有得意之色。我心想：这些小日本鬼投降了，还这样骄傲、自信而有秩序。今后对其实不能掉以轻心，对投降的日军尤须严肃处理。

晚10时，接到三十一师副师长王建业派传骑送来的紧急电报指示：“令刘一平指挥步、骑先头部队入晚即到包头以西地区，于明晓经飞机场占领包头火车站。制止站台上的日、伪军之行动，不许他

们搬运物资。”我于8月14日8时占领包头火车站。站台上集中的物资甚多，有近百名伪军正在搬运、掠夺，弄得遗物遍地，零乱不堪。我派人把他们驱逐出车站后，即令军队将物品收堆起来。

正拟将占领车站情况向师里报告时，恰好接到师部送来命令：“令即上车东进，到萨县后归还建制。”在部队上车的过程中，约9时，看到傅作义将军及参谋长贾璜等到达车站。我拟顺便向傅、贾报告我担任先头部队执行任务的情况。但看到傅面有怒色，似在指责什么人。我询问其随从不官，始知是三十一师少校参谋马毅英拿日军遗留的文件用纸时被傅看见，要将马就地正法等情。马则在申辩冤屈，贾璜正在说情。此时师部派人督促我急速上车东进。我上车时正好汽笛长鸣，不待我踏进车厢，火车便徐徐向东开去。接着整个三十五军也都继续东进。包头的日、伪军由哪个部队受降，就不清楚了。

以上就是艰苦抗战八年，在日本投降，傅部正规部队出河套东进受降时，作为傅部主力的三十五军最先头部队占领包头之经过概况，特记之。由于事已过40多年，时间、地点、情况均记忆不清，错误、遗漏在所难免，希望识者指正。

（钱仲美 整理）

回忆我党领导的豫北师管区训练班

傅大章

(一)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对我国的大举入侵。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号召抗战的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侵略，广大人民无不义愤填膺，各地的爱国进步青年，纷纷要求到前线去，或者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救亡活动。由于我党的不懈努力，抗战开始后不久，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又称第十八集团军）。为了进一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共北方局负责人之一的朱瑞同志，出任了第十八集团军驻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联络处主任，活动在河南省新乡等地。

在新乡，国民党有个豫北师管区司令部。司令张轸，北伐时任过第六军（党代表为林伯渠同志）的第十八师师长。后来他受蒋介石排挤，曾一度避难到日本，1936年任现职。他赞扬宋庆龄和邓演达先生，主张坚决抗日，拥护国共合作；他希望得到我党的多方帮助。师管区参谋长秦鼎新，和张的关系亲近。副参谋长詹行旭，则是一个军统分子，进行反动破坏活动。

(二)

为了培养大批干部，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朱瑞同志和张轸司令商定，在新乡西关农业职业学校办一个训练班，训练学生和军官。训练班经费由师管区负责。刘子超同志任主任，庄林同志任大队长。分学生队和军官队。训练的课程，有军队政治工作、抗日游击战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别由朱瑞和刘子超同志讲授。

训练班于9月底开学。军官队是师管区召来的军事干部。学生队的来源，首先是平津来的11个流亡学生，他们大多数是大学生，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其次是开封来的一百零几个男女同学，他们是党组织和杜毓沅等进步教师动员来的，都是高中、高师学生；再次是我党豫北特委动员的社会知识青年；不久，冀南地下党动员的清丰、南乐一些小学教师和学生，也先后到来。

训练班中的共产党员很少，当地的有周致远，平津来的有刘刚（刘祖章）、杨波（杨润普）；开封来的有我和赵玉亭（女），冀南来的有张玉洁（女）和赵松针（女，现名刘文树）。此外，有在平津、开封等地参加我党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的一些队员。学生中还有几个原来是我党党员或共青团员，而后失掉关系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是周致远，不久，他回地方；第二任支部书记是太原来的敖纪民（现名高锦明）。民先队长先后由杨波、万达担任。当时国民党对我党仍在进行镇压破坏，党组织和民先组织处于秘密状态，仅朱瑞同志和他的随员是公开身份，但是他们的行动则受到国民党的严密监视。

在训练班，朱瑞和刘子超同志讲的内容都是我党的主张，他们讲得非常有说服力。朱瑞同志是个公开的共产党人和红军负责人，他出面讲课一下就轰动了好乡。上课时不仅受训的人听，也来了不少旁听的人，没有座位就站着听。

过去国民党在河南大搞白色恐怖，我党组织几度遭到破坏，大批党员惨遭屠杀。就在1937年4月，开封民先组织还遭到了破坏。因此，群众对我党的主张了解不够。抗战开始后，华北前线国民党在日寇进攻面前，大多是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溃，敌人长驱直入。广大群众对日寇痛恨万分，对国民党的无能，感到非常愤慨。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反映更为强烈。怎样抗战救国？这是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

在这个关键时刻，大家在训练班上不断听到我党的主张和红军改编后纷纷开赴华北前线作战的消息，特别是9月下旬我军在平型关对日军作战取得重大胜利的消息，受到很大的鼓舞。通过训练班的学习，大家明白了国民党何以如此无能。最大的收获是认为听到了真理，找到了抗战救国的正确途径；认为共产党正确，只要按照共产党的主张办，抗战就一定能胜利。张轸也不时来到训练班讲话，表示坚决抗日，实行三民主义。大家对他表示好感和尊重。当时朱瑞同志的讲话不胫而走，很快传到黄河南北，许多知识分子纷纷来训练班要求参加学习。开封先后有几批同学前来，有的女同学把十三、四岁的小妹妹也带了来。开封女师黄维（黄素娥）等同学，来参加训练班学习，师管区司令部把她们留下，不让到训练班，她们偷偷跑了几次，终于到了训练班。上海也有几个工人同志辗转来此参加学习。

训练班是个革命大熔炉，虽然时间很短，但革命的真理陶冶了每个青年的思想和意志，大家进步很快。开始时有些同学因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有不少糊涂认识，通过听报告，认识一步步转变了。当时大家的共同特点是渴望真理，在学习讨论中，争论非常热烈，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认识深化了，革命友谊加深了。因此这个短暂的学习，使大多数同学不仅明白了如何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问题，也奠定了为革命奋斗终身的思想基础。

(三)

训练班的成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分子——师管区副参谋长詹行旭的惊慌。他感到仅仅监视朱瑞等同志的行动不行，便从开封、郑州找来十多个学生到训练班来。为首的孟庆勋、申成直等是复兴社骨干，他们来的目的是要破坏训练班。他们来后，以为讲讲“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论调，便可蒙蔽大家，结果适得其反。孟庆勋感到形势不妙，为了稳住自己的阵脚，常常把一道来的人搞在一起活动，但这又孤立了自己。后来他们中有的人转变了思想，和大家站到了一起。

由于詹行旭一伙的不断干扰，朱瑞同志和张轸商定，在10月下旬把训练班搬到辉县百泉师范学校。这里风景好，有山有水、又清静，是个学习的好地方。可是詹行旭一伙更加紧了破坏活动：一开始，他们张贴小字报，对朱瑞、刘子超同志进行人身攻击。遭到揭露后，他们又写匿名恐吓信并装上子弹送给朱瑞同志，扬言要杀死他。朱瑞同志在讲课时公布了这些东西，痛斥了特务的卑鄙勾当，表示共产党人决不怕恐吓。大家对国民党特务的卑鄙行径非常气愤；詹行旭同时还派人偷听同学们的谈话，被同学们当场捉住，扭送给刘子超同志，经教育承认错误后放走了。詹行旭一伙本来想搞垮训练班，但不仅未达到目的，反而当了生动的反面教员，使大家认清了他们的反动面目。

(四)

张轸有两营部队，分别驻在焦作和博爱县城。11月10日训练班结业，军官队分到部队去了；学生队有30多人到两个营去做政治工作，又组成7个队到豫北几个县做民运工作。大家的情绪很高，在

工作中把学到的东西向士兵和群众进行宣传，收到一定的效果。

这时敌人已进到安阳。根据当时情况，新乡一带不久即可能被敌人占领。同学们共同的想法是坚决留在豫北或到其它抗日前线去战斗。为了表示这个决心，有的同学编了一个《誓死不过黄河》的歌子，在部队和群众中教唱，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11月，上海、太原相继失陷。毛主席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朱瑞同志为了培养更多的干部，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到山西晋城，创办华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简称华干），仍由刘子超同志负责。这时由于党的影响扩大，许多社会知识青年继续来找朱瑞同志。河北省大名师范教务长晁哲甫，河北省教育厅督学孟夫唐和教师王振华、杨钗九等更是带着学校公款前来，开封的进步教师杜毓沅、张柏园也来了。连同师管区训练班留下未分配的学生均搬到了晋城。因为华干的领导和学生骨干，是由师管区训练班去的。训练班和华干又都是由朱瑞和刘子超同志领导的。后来有的同志称师管区训练班为华干第一期，晋城办的为第二期。

1937年11月，正当我们在基层工作的时候，蒋介石决定张轸所部和独立第四十六旅在焦作组建一个补充师，下属四个团，张轸任师长。并令该部到河南巩县孝义镇驻防。12月上旬，我们被通知到焦作工学院集中。集中后，张轸要同学们随军南下。大家说我们是到前线抗日的，怎能不打敌人，反而到黄河南去！表示坚决不过黄河。张找朱瑞同志帮忙，朱瑞同志为了照顾大局，又考虑到张轸部队开展政治工作的需要，说服了大家，结果有100多人（包括孟庆勋等）同意南下。朱瑞同志为了继续和张轸保持联系，决定派敖纪民任他和张轸的联络员，党的工作由敖纪民继续负责。但敖纪民到孝义镇不久，即调回晋城。党的工作由我和刘刚、杨波、赵玉亭等同志组成支部，我为书记，其他同志为委员，仍由朱瑞同志直接领

导。

(五)

12月中旬，部队到孝义镇，我们的处境即逐步恶化起来。这时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局虽已形成，但国民党顽固派却执行着“一面抗战，一面限共”的方针，因此斗争越来越尖锐复杂。詹行旭没有随军南下。师政训处来了个处长叫陈尧，他比詹行旭狡猾，软硬兼施，想方设法要把学生队“吃掉”。张轸也建立了一个小组织，以巩固他的部队。面对这个复杂斗争的局面，把南下的大多数同学团结好，在斗争中提高，在斗争中进步，这是我们党组织的任务。这样就必须更加深入细致地做好工作。

我们设法找来《党的建设》等文件在党员中传阅学习，以增进党员对党的认识；我们不时地把同学中符合入党或入队条件的积极分子，分别吸收到党组织或民先队中来；同时不断发现要求进步的同学，分派党员或民先队员去具体进行帮助；对一时落后的同学，我们并不嫌弃他们，而是怀着热情的态度，去主动接近和帮助他们。同学们大都是热爱共产党的，我们党组织的成员都是学生，没有任何职务，但我们党员通过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革命道理，并以自己的行动去影响大家，取得了大多数同学的信任。因为大家有着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础，我们在斗争中逐步团结了大多数，形成了一个战斗的集体。

在孝义镇，我们一直被集中学习。师的团、营、连军官，也分批和我们混编在一起学。张轸的老朋友王毅斋博士负责学生队的工作。王博士对蒋介石的反动措施不满，他平易近人，和大家的关系比较好。讲课的有杨超人，讲民运工作。一道受训的团营干部，多系独立四十六旅的。这个旅原来系冯玉祥将军抗日同盟军的部队，并有我党的组织，后同盟军失败，部队被改编。之后，党组织遭到破